

后金融危机时代阴影下的德布林研究成果述评

张 晖

内容提要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由政治精英主导的欧盟一体化进程暂时受挫，而日益流动的欧洲社会底层却出现大众再度集结的态势。随着新时代问题的涌现，西方的德布林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本文将德布林重新置于经济大萧条和充满硝烟的时代背景中，对其小说及文论作品折射出的与当下极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流动性大众社会与媒体、跨文化移民与文明冲突、流亡和逃亡等进行具有当下时代特征的深度思考，以期为德布林研究提供多种新颖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大众 媒体 金融危机 个人 移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债问题、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入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以及由英国脱欧和法国黄衫军运动可能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欧洲人本已脆弱不堪的神经。在这些问题漩涡面前，身处欧盟核心区的德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德国知识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受挫的局面中，开始重新思考个体与群体的微妙关系，审视媒体在动员大众方面的幕后操纵力，预测移民和本地族群之间文化冲突的烈度与融合的可能性，并将无远弗届的流亡或逃亡行动作为个人以及整个族群的“命运之旅”重新作出评价。

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问题所触发的思考转向不仅影响到德国公共领域，而且也德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新视域。德国文学研究者惊讶地发现：早在一个世纪前，杰出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 1878—1957）就已开始对上述问题展开过文学幻想式的描述，并运用逻辑思辨剖析其成因。正因为其文学关怀本身已然蕴含着与当下时代特征的多重契合性：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背景、战争导致的族群冲突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生存危机碾压下的个人面对集体时普遍怀有的随波逐流心态和茫然无措感，所以研究德布林作品中的“大众诗学”“大众传媒”和“移民阴影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等课题在成为当今德布林研究新动向的同时，也可被视为其传统研究视角的再度锐化。

一、大众诗学

德布林以超越常人的敏锐眼光率先洞察到包含文学在内的美学与城市化、工业化和技术化进程的啮合现象。也就是说，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促使现代化城市呈现出“珊瑚树”般的结构状态。这种社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在1900年前后催生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批评，批评者排斥都市化，质疑现代性，并把都市的毁灭本质与大众的暴力倾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大众化进程又引起了视听读写等多元性媒体文化的勃兴。德布林在他的《王伦三跳》（*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瓦德策克和汽轮机的斗争》（*Wadzeks Kampf mit der Dampfturbine*）及《1918年11月》（*November 1918*）等多部长篇小说中，都讲述了处于剧变年代的大众、媒体和个人主体性的对抗与融合，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写作态度定调为对大众社会保持开放的和谐/妥协心理，这一点与赫尔曼·布洛赫在《梦游者》里表现出的心态截然相反，后者将大都市里的大众行为和大众体验贬斥为半梦半醒者的梦游状态。虽然德布林面对大众社会时所持心态更加中庸，但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在流亡过程中的孤独命运，而这样的命运恰恰是个体在当代大众社会中所必须忍受的。

萨宾娜·贝克尔根据德布林的大量美学著作，分析了作家在技术-工业化的媒体社会氛围中形成的文学观，并揭示出蕴含于其中的反个人主义和反心理学至上主义的美学倾向。贝克尔在多篇文章中提出，之所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孕育出了以德布林为代表的“都市美学”（例如“蒙太奇”技巧），原因正是当时的德国社会及德国文化同时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现代化和媒体化的历史性变革，而这一进程迄今似乎并未完全中止。^①

大卫·米奇利则在《“他们像蜜蜂一样掠地而来”——德布林小说中大众描写与生物学的关联》一文中，挖掘出德布林在《自然之上的自我》（*Das Ich über der Natur*）和《我们的此在》（*Unser Dasein*）等散文集里显示出的生物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富知识，借此阐述了《王伦三跳》《山、海和巨人》（*Berge, Meere und*

^① Sabina Becker, „Urbanes Epos der Moderne: Alfred Döblins Berlin Alexanderplatz“, in *Lectures de Berlin Alexanderplatz/Alfred Döblin*, Bernard Banoun und Michaela Enderle-Ristori, Hrsg., Nancy: Cegil-Nancy, 2011, SS.7–24. Sabina Becker, „Expressionistische Sonderwege: Alfred Döblin in Freiburg“, in Achim Aurnhammer et al., Hrsg., *Poeten und Professoren: 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Freiburgs in Porträts*, Freiburg i. Br.: Rombach, 2009, SS.255–278. Sabina Becker, „Korallenstock‘ Moderne: Alfred Döblins Poetologie“,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Bern: Peter Lang, 2014, SS.33-50.

Giganten)、《柏林, 亚历山大广场》等小说独特的叙事技巧——在描述战争、移民潮以及大众社会景观时, 作家频繁动用了他在医学和细菌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①对德布林而言, 大众构成的都市犹如一个有机体, “只是一种永远忙碌的过程, 在时间的维度里永不终结地扩张着、占领着”^②。德布林以大众社会的“永生性和永动性”彻底瓦解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有机体都无法逃离趋死本能之宿命”的心理学观点, 也迥异于斯宾格勒等同时代知识分子做出的“城市生活是文化发展的板结状态”的论断。

针对德布林最富大众社会畅想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山、海和巨人》, 弗里德里希·万慕斯甘茨、约翰内斯·劳瓦尔德和克里斯多夫·布尔特曼三位学者以各不相同的立论角度和理论工具展开了全方位的“大众诗学”剖析。

万慕斯甘茨关注的是《山、海和巨人》夸诞的语言风格和深邃且具展望性的历史感, 他在《德布林的〈山、海和巨人〉里的“众人”: 超现实叙事作品中的时代批评、预知和预测未来》一文中提出, 德布林这部发表于1924年的作品, 外观上披着先锋派未来小说的外衣, 实质上却传达着作家对一战的感受, 描述了对十一月革命和魏玛共和国政治的细腻观察。万慕斯甘茨提出, 德布林在心理医师职业生涯中磨练出的敏锐观察力对《山、海和巨人》里描绘大众社会这种现代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③当作家畅想公元二十七世纪的西方世界如何走向混乱与衰退时, 其预见力也同样令人啧啧称奇。在《德布林文学中的不幸》一书中, 万慕斯甘茨总结道: 《山、海和巨人》里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拥有者, 其狂妄的嘴脸在大众面前是毫不掩饰的, 他先在底层民众中大规模地挑选不服从者杀鸡儆猴, 然后驯化余者, 继而剥夺他们每个人的个人性。^④德布林通过文学作品成功地预见到十年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以及在其统治之下出现的技术崇拜、群体癫狂、大众迷信、国家暴政、全面战争、大屠杀、逃亡和驱逐。该小说的政治-文化前瞻力如此超越时代, 以至于今天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时, 依然隐隐感到震惊。

劳瓦尔德在专著《虚幻性的政治-文学诗学: 论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德布林(自我)变更力的潜能》里, 运用了希腊裔法国左翼政治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斯创立的当代社

① David Midgley, „Wie die Bienen sind sie über den Boden her: Zu den biologischen Bezügen der massendarstellungen in Döblins Romanen“,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 52-65.

② Alfred Döblin, *Das Ich über der Natur*, Berlin: Fischer, 1928, SS.103-110.

③ Friedrich Wambsganz, „Masse Mensch“ in Döblins *Berge Meere und Giganten: Zeitkritik, Vorauswissen und Zukunftsahnung im surrealen Erzählwerk*,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87-107.

④ Friedrich Wambsganz, *Das Leid im Werk Alfred Döblins*, Frankfurt a. M./Bern u. a.: Peter Lang, 1999, bes. SS.218-221.

会理论来解读《山、海和巨人》。^①在《社会的虚幻性建制》一书中，“虚幻性”被卡斯托里亚迪斯抬升至本体论思考者的高度，并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导概念来阐释各类文化-社会现象，同时该书还剖析了“虚幻性”作为大众思考者是如何成形、如何被接受以及发挥作用的。这一文化-社会理论构想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对《山、海和巨人》这种描述大众现象的反乌托邦小说而言极具启发意义：在卡斯托里亚迪斯提出“岩浆本体论”之前五十年，德布林就已在《山、海和巨人》中将身份各异、同时又难以名状的大众比喻成涌动的“岩浆”——他们在流淌过程中既充当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成为推动小说情节的关键转折；而德布林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高度岩浆化的特质，他将虚幻性和现实性以流淌漫衍、汪洋恣肆的方式完美地熔融在一起。

布尔特曼在阐释《山、海和巨人》这部“未来史诗”中的大众现象时，采用了生态学历史的角度。他在《可怕的大众》一文里，借助昆虫学家弗里德里希斯和内陆水系学家蒂内曼所确立的综合性普通生态学理论以及海洋生物学家莫比乌斯提出的“生命共同体”和“生物群落”等概念，对《山、海和巨人》所反映的生态危机展开了话语分析。^②人口暴增、资源枯竭、原料消耗、殖民扩张、环境污染……这些生态系统崩溃现象被德布林归因为人口和技术之间的良性-恶性循环的悖论关系。以分子状态聚合并行动着的人类大众，在瓦解自然系统完整性的同时，终将反噬自身。鉴于此布尔特曼认为，在德布林的头脑世界中人类这一终极命运与其说是灾难性质的，毋宁说是合乎内在逻辑的。而不断滋生的大众以其特有的无度性，既构成了该小说的内容，又赋予其杂糅美学的独特外观。

二、大众社会中的个人悔改

德布林相信文学作为一门艺术，不论是在创作方，还是在接受方，既生成着个体性，也生成着超个体性。一方面，文学要求并强化了书写者和读者在孤独状态下的专注力；另一方面，文学在满足个人遁世心理之余，又唤起了艺术之于共同体所承担的交流功能。《我们的此在》是德布林流亡前在德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德布林在该书中曾对艺术作出了一个座右铭式的论断：“我们再重申一遍：艺术关系到……自动

^① Johannes Rauwald, *Politische und literarische Poetologie(n) des Imaginären. Zum Potenzial der (Selbst-)Veränderungskräfte bei Cornelius Castoriadis und Alfred Döbli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3, (Studien zur Kulturpoetik, Bd. 17).

^② Christof Bultmann, „Monströse Massen: Zur Ökologie in Alfred Döblins *Berge Meere und Giganten*“,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127-148.

克制个性化的发端……，也即在形塑风格方面超个体性如今正大规模涌现。”^①这一艺术论断透露出德布林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热衷于反映个人与集体的纠结关系。

托尔斯滕·霍夫曼在《在大众里解放人》一文中，根据德布林为恩斯特·托勒尔的名剧《群众与人》所撰写的剧评，深刻剖析了两位文学家对“个人在大众面前究竟应该臣服还是抗拒”这个问题所共持的协调态度。^②《群众与人》里的女主人公在被处死之前依然相信，大众中人的毁灭以及人性的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寄托于未来。所以，霍夫曼选取了剧本里的一句台词——“在大众里解放人”——作为论文题目。在此短语中，托勒尔使用的介词是“in”，而不是通常情况下与“解放”这个动词搭配使用的“aus”，也就是说，剧作家并不主张“从大众里把人解放出来”。这种对个人与大众的依存关系所持的肯定态度，正是德布林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等多部小说里所采取的略带乌托邦色彩的写作姿态。

同样是关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埃尔齐奥·洛雷罗·科内尔森在《一位反英雄由自我中心走向团结的道路》中，结合德布林完成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写作前后的自然哲学散文集《自然之上的自我》和哲学-政治学论文《知与变》，得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一部“反-教育小说”的论断。^③其论据是，最后促使小说主人公以负责任的态度融入群体中去的力量源于一次顿悟，而非通过缓慢的受教育、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实现。在德布林的话语里，“大众”和“集体”以及“无产阶级”间或被混淆着使用，而“社会”往往被赋予某种生命主义式的有机性。小说主人公最后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但这并不等于他准备立即与大众发生联系，因为他也意识到个人在大众面前应负的社会责任。虽然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可是他顿悟到人不应盲目地把自己整合到任何一种集体里去。当一个社会的民主核心发生内爆时，德布林警告人们要当心极端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当他们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开始以准军事武装组织的方式占领大街小巷时，势必会造成政局的动荡。《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成书的时代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发表后数年间德国全面纳粹化，十年后整个欧洲便陷入灾难深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数犹太人死于非命或被迫流亡，流亡队伍中便有德布林的身影。时至今日，同样身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面对各地不断抬头的群体性

① Alfred Döblin, *Unser Dasein* [ED 1933], Walter Muschg Hrsg., München: dtv, 1988, S.242.

② Torsten Hoffmann, „Mensch in Masse befreien: Masse und Individualität in Ernst Tollers Drama *Masse-Mensch* und seinem Vortrag *Man and the Masses*“,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151-166.

③ Elcio Loureiro Cornelsen, „Der Weg eines Anti-Helden von der Egozentrik zur Solidarität: Betrachtungen zum Anti-Bildungsroman *Berlin Alexanderplatz*“,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167-176.

事件感到茫然无措的读者，不得不钦佩作家超前的预见力。

克里斯蒂娜·阿尔腾在《大众偶像对抗悔改》一文中，根据新发现的德布林《哈姆雷特或漫漫长夜有尽头》1956年原始打字稿沉出原初的情节设置：主人公爱德华·艾利逊在小说结尾处遁入空门，从而完成由一位名利双收的大众偶像到归隐尘寰之外的遁世者的转变。^①此外，阿尔腾还发现德布林曾为该小说考虑过多个题目，如《哈姆雷特或受惩罚的好奇心》以及《谎言的漫漫长夜已尽》。依据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长夜”这一意象象征着“罪感的阴晦”，它的结束不仅隐喻着人与上帝之间的握手言和，更传达出大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重归于好，虽然无论在战乱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们都从未停止过将彼此的生活推向深渊。

三、大众与媒体

德布林对“媒体”这一概念的认知和使用不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将其理解为出于“传播目的”的“工具”和“技术手段”，诸如：书籍、广播、剧院和影院等。而像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电影，都被德布林视为服务于表达、塑造和描绘的“艺术”。但同时他也指出，基于技术之上的媒体不同程度地向公众输送着艺术，所以媒体绝非消极的信息搬运者或中立客观的渠道，而是始终参与着艺术作品的符号生成。按照德布林的理解，大众和媒体必然相互关联：媒体制造出集体意识的实质性内容，为大众指明方向；而大众极易受媒体引导，把自己交付给媒体制造的信息洪流。媒体和大众之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风行草偃的关系，唯一原因是大众的无产阶级属性。在此，“无产阶级”指的并非社会地位，而是指在有产者-个人主义的雅文化之外形成的一个“新种族，一种崭新的有生力量”。^②将自身与精英区别开来的大众却经常与谣言为伍，德布林认为这些虚假性信息“构成了当今所有庞大民族集体意识的主要部分”，传单、海报和煽动性文章对此“功不可没”。^③

针对德布林文学中的“大众与媒体”这一课题，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就已经有学者重新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主动靠拢作家的媒体人类学思考核

^① Christina Althen, „Massenidole versus Metanoia Notizen zu Döblins Hamlet und der wiedergefundenen Originaldruckvorlage von 1956“,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199-227.

^② Alfred Döblin, „Republik“, in Heinz Graber, Hrsg., *Ders.: 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Olten/Freiburg i. Br.: Walter, 1972, S.125.

^③ Alfred Döblin, „Wissen und Verändern! Offene Briefe an einen jungen Menschen“, in Heinz Graber, Hrsg., *Ders.: Der deutsche Maskenball von Linke Poot. Wissen und Verändern!*, Olten/Freiburg i. Br.: Walter, 1972, S.263.

心，并为此后一批相关课题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促使他们转而关心德布林对人的基本定义、对个体性和超个体性的理解以及对二者之于艺术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

彼得·耶拉维奇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广播、电影和魏玛文化的死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媒体在机器与人类共同成长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民主和政治性大众一体化所肩负的责任。^①他在近作《机器人：德布林作品中的媒体性聚众》里提出，德布林非常清楚技术-媒体化时代的到来是无法阻止的，但是技术-媒体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威胁也不容小觑。^②那么，人应如何在不把自身异化为机器人的情况下应对机器人和媒体呢？通过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大众社会若无民智初开、意识自觉的共同体制约，将会在很短时间内滑向法西斯主义，甚至会永远堕入《山、海和巨人》所描写的反乌托邦式假想社会状态。

萨宾娜·齐奥拉也较早关注到现代技术媒体在二战前德国迅速纳粹化过程中起到的可怕作用，她在《“我了解德国人”——德布林关于纳粹和大屠杀的分析》一文中提出：“在德布林看来，纳粹的宣传导致了某种大众歇斯底里症的发作，于是个人的理性失效了。”^③在《（大众）传媒：德布林作品中的媒体间性和主体性》，她进一步研究了德布林作品中主体对媒体的接受及大众交际的跨媒体状态。^④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德布林从未以内视角对媒体机制展开过叙述，在其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大众传媒领域里的工作者或对媒体进行抨击的批评者，其笔下人物也从未屈服于媒体的淫威，即便媒体之于大众而言具有普遍有效性。另外，时常被现代作家反复探讨的由媒体促成的市场化也未引起德布林足够的兴趣，真正令其感兴趣的是媒体和大众、个人间的关系，以及大众传媒提供给人的信息和人对媒体进行主观利用之间的交互作用。

达格玛·冯·霍夫在研究《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时提出一个新视角，即通过分析原始手稿来考察作者如何提高大众的主体地位，而媒体又是怎样变为大众喉舌并最终将大众送入战争深渊的。他在《德布林作品中的大众、媒体和灵媒——以〈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为例》一文探寻出德布林小说始终跟踪的一个兴趣点，即对媒体

^① Peter Jelavich, *Berlin Alexanderplatz: Radio, Film, and the Death of Weimar Culture*, Berkeley/Los Angeles u.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② Peter Jelavich, „Maschinenmenschen: Mediale Massenbildung bei Alfred Döblin“,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251-274.

^③ Sabine Kyora, „„Ich kannte die Deutschen“: Alfred Döbli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n Christine Maillard/Monique Mombert,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Strasbourg 2003*, Bern/Frankfurt a. M. u. a.: Peter Lang, 2006, S.194.

^④ Sabine Kyora, „(Massen-) Medien: Intermedialität und Subjektivität bei Alfred Döblin“,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275-288.

制造的环境表象和大众现象的兴趣。^①《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万花筒般的场景转换令小说比电影更具电影特质。正因为德布林惯于在文本中使用“蒙太奇”和“联想技巧”，整部作品才充满诗学的放任性，呈现出庄子所谓的“卮言”美学气韵——曼衍、多义和互文性。^②

多伦·沃尔雷本在文章《人的修复——德布林和广播散文》中针对“广播散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其体裁的问题。^③德布林曾预言：在叙事文学、戏剧和诗歌之外，散文将异军突起，并会随着广播的普及而变成极其重要的文类。广播作为诉诸听觉的媒体将文学读者转变为听众，貌似扰乱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学阅读传统，实则引领受众回归文学的源头——口头对话。而德布林的散文随笔恰恰利用了广播的这一特性，将自身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耳代目，言简意赅。此外，德布林为增强接受效果，继承并发展了蒙田散文反映文本自身生成过程的传统，还频频在广播散文中使用“你”这一充满亲和力的第二人称，瞬间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他的广播散文貌似没有章法，实则发展出一种如阿多诺所说的“没有章法的章法”。由此，散文这种文学体裁之于德布林而言已不再是纯粹的美学形式，而是一种始终被寄予巨大政治期望的文类。借助散文与广播的结合，德布林如渴望“无遮拦地思考”的汉娜·阿伦特那样实现了更为广大的文学活动空间；或像布莱希特和本雅明所理解的那样，广播散文可以在大众间普及知识、增强社会化谅解、对繁缛压抑的贵族文学进行颠覆。虽然在德布林的广播散文里“个人”成为主题和预设受众群，但与以往文学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被英雄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

作为媒体的广播与文学、政治以及道德重建发生了紧密关联。以此为出发点，亚历珊德拉·柏克特对德布林于1946至1951年在西南德广播电台所做的每期十五分钟的节目“时代批评”以及由此引出的一连串政治“启蒙运动”做了进一步研究，提出德布林借助专题系列广播的连载性强、篇幅小、受众面广和创作尺度自由等优势，将自己的“新启蒙运动”付诸实施。^④德布林见证了第三帝国时期由于大众社会个人道德缺位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政治悲剧和战争灾难，战后他便立即投身于针对德国人“道

ADagmar von Hoff, „Berlin Alexanderplatz: Masse, Medien und Medialität bei Alfred Döblin“,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289-311.

② 参见张晖《蒙太奇旋涡中的解离-联聚-整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③ Doren Wohlleben, „Restauration des Menschen: Alfred Döblin und der (Radio-) Essay“,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313-324.

④ Alexandra Birkert, „Alfred Döblins Radiosendung *Kritik der Zeit* (1946—1951) : Ein Schriftsteller auf dem schmalen Grat zwischen Massenlenkung und Massenaufklärung“, in Stefan Keppler-Tasaki, Hrsg., *Internationales Alfred-Döblin-Kolloquium Berlin 2011*, SS.325-345.

德恢复”的人文事业中来。德布林不仅相中了广播所独具的巨大影响范围，还敏锐地体会到听众收听广播时的居家封闭性——在摒除人群间情绪感染的情况下接受广播中言说者的思想布道。德布林在洞察到广播于战后德国民众思维重建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预见到广播所导致的信息垄断现象，但最终他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媒体垄断方能向大众普及民主思想。

结 语

人类社会作为聚合形态的生存共同体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巩固着自身。大众的集体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其外部形态，还是由此推导出的生存法则，都成为作家无法规避的书写主题。如何理解“大众”所蕴含的自然因子和文化因子，如何利用写作者的智慧去感知当下的集体意识状态，如何协调大众生活形态和个人的生活需求，如何认知媒体为民主社会或非民主社会所提供的交流可能性，以及借媒体而制造出的宣传和煽动是如何走上合法或非法道路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德布林出于作家（大众传媒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的责任感而反复思考的对象。时至今日，貌似繁荣的全球虚拟经济不但导致了比德布林那个时代更为频仍的金融危机，而且还催生出更加膨胀的大众社会，并由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族群内部失序和族群间生存挤压等社会冲突。正是鉴于生存困境的高度相似性，文学研究者如今开始集体追踪德布林百年前关于大众社会的文学思考和美学实验，这与其说是研究领域内的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一种期望——期望在德布林营造起来的文学乌托邦里得到某种启示，即便这种启示在不可重复的未来仍带有幻灭色彩。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王 涛